

1401

南昌文史資料

第
一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南昌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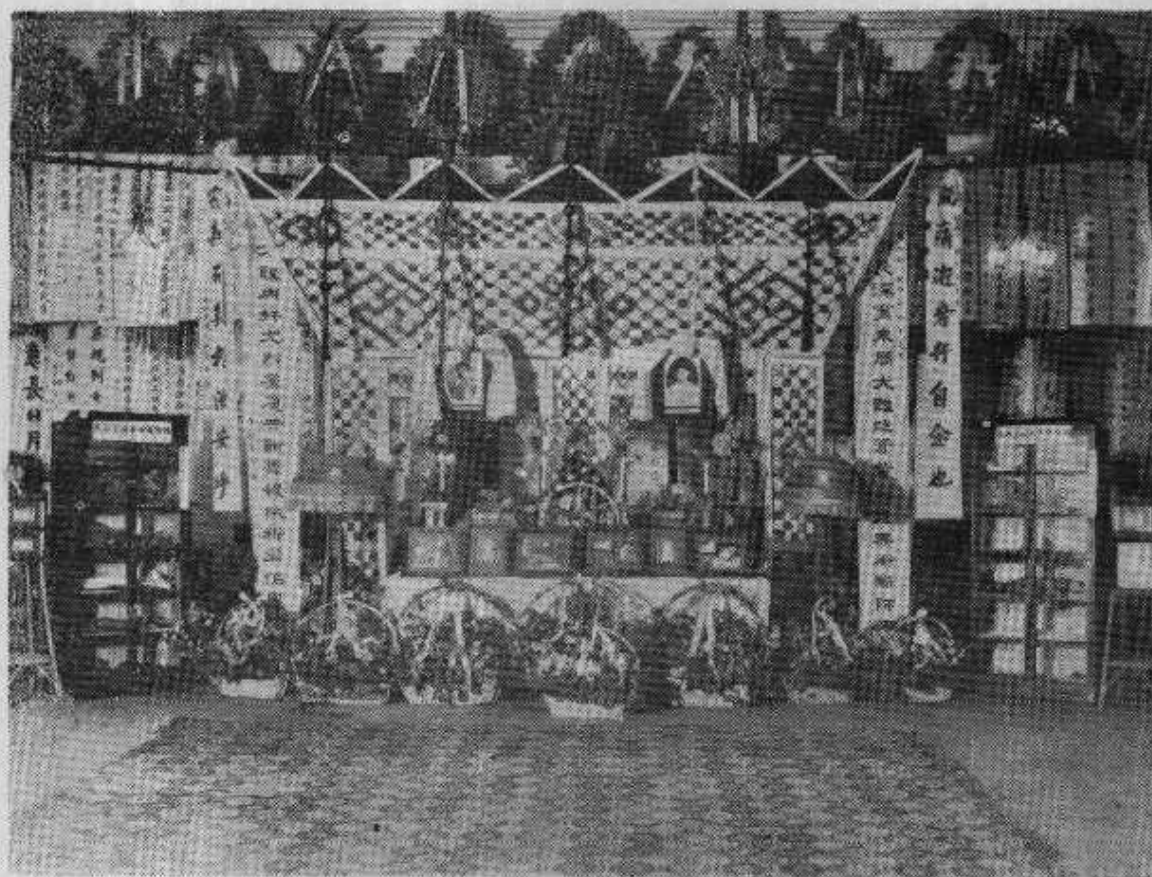
744/35

南昌文史资料
(选辑)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南昌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H84/35



刘和珍烈士牺牲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礼堂举行追悼会的悲壮场面。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军部成立，陈毅、项英等同志在南昌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张云逸、第二人叶飞，第三人陈毅、第四人项英，第五人黄道。后排左起顾玉、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目 录

从“八一”到解放的南昌革命斗争历程	张 琳 (1)
我所知道的刘和珍	华观澜 (33)
大革命时期南昌妇运的片断回忆	周涵真 (45)
怀念胞姐萧国华烈士	萧国钰 (49)
姚显微教授抗日殉难始末	王咨臣 (53)
记蔡敬襄及其事业	王迪淑 (64)
我与南昌一中	吴自强 (78)
私立赣省中学简介	王 林 (91)
解放前南昌市小学教育的回忆	舒宽鑫 (95)
解放前办小学的几点回忆	李昌元 (115)
特种教育是什么东西!	石 亭 (121)

从圣类思医院到南昌第三医院…………… 杨 泓 (127)

回忆抗战胜利后南昌各报记者的活动

…………… 方家瑜 (137)

“鼠疫南征”祸赣垣…………… 徐燊埔 (150)

记南昌解放前夕的学生报…………… 罗时烽 (154)

文山报与杨不平…………… 龚 屏 (160)

南昌力行日报丑史…………… 庄祖方 (165)

三青团的青年报…………… 赵则平 (179)

关于《南昌八一起义介绍》一文中有关武汉警卫团

资料的辨正…………… 刘厚中 (182)

关于回族丧葬风俗的一点订正…………… 王晓舟 (184)

丁笏堂轶事一则…………… 熊振敏 (186)

从“八一”到解放的南昌

革命斗争历程

张 琳

一、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青年学生

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

八一起义的队伍撤出南昌进军广东后，南昌又转入了黑暗的反动统治，反动派更加凶残地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扑。统治南昌的反动头目，仍然是第三军军长兼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和所部师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均。一九二八年十月，湘军首领谭延闿被蒋介石授以行政院长职位，原为他的嫡系第三军付军长鲁涤平在谭的保荐下，调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鲁的亲信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任为南昌卫戍司令。张辉瓒来南昌后，飞扬跋扈，强取豪夺，杀人如麻。南昌市民称之为“张屠夫”。一九三〇年农历正月，一次从景德镇押来南昌的进步青年徐荣祥（方志敏同志的秘书）等三十人，除一人有人营救判处徒刑外，其余全部杀害。八月三十一日，一次就屠杀爱国青年七十多人，所有拘留所的在押人犯，几乎全部杀光，人们称之为“清监”。尽管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变本加厉，学生们仍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从1928年底开展了驱逐AB团分子陈颖春（际唐）的斗争，直到第二年三月。“八一”起义后，原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合并，改组为第一中学，由AB团骨干分子陈颖春任校长，陈对一中二院（原第一师范）的学生百般歧视压制，二院学生于是酝酿师范独立，学生张贴通告讨论师范独立问题，陈颖春竟无

理开除学生刘以望、胡载球两人，引起学生公愤，立即罢课以示抗议，陈还进一步报请伪教育厅宣布解散二院。这样更激怒了同学。在地下共青团组织的推动下，学生成立了“驱逐陈颖春运动委员会”，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教育制度的斗争，提出了“驱逐AB团校长陈颖春！”“推翻反动的教育制度！”“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这个运动获得了南昌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成立了“一中二院驱陈后援会”，学生们坚持了六个月的斗争，终于迫使陈颖春以“考察”名义，离开学校，被开除的学生仍然复学。但是过了一年半以后，陈又回校“复职”，而且对参加过反陈斗争的同学，竟以“共党嫌疑”，迫令退学或开除，甚至报由卫戍司令部逮捕枪杀。1932年春又爆发了第二次驱陈运动，终于迫使反动当局将陈撤职，取得了最后胜利，在运动中学生们的锻炼得更加坚强。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激起了全国各地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1——1932年春，南昌人民掀起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反对日寇侵略的斗争高潮，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接着又进行了反对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何梅协定》的爱国运动。南昌的反帝爱国斗争一直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发生时，反动政府先后逮捕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达数百人。但是英雄的南昌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始终把革命斗争坚持了下来。

二、南昌普罗文艺运动

从一九二九年冬到一九三〇年夏，在“左联”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和南昌地下党的具体组织下，南昌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中，掀起了一次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高潮（亦称普罗文艺运动，普罗是Proletariat的译音，意即无产阶级）。这次高潮前后有半年多时间。开始时，成立了许多不同名目的文艺社团，

如《追求社》等十多个。这些文艺社团，各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其中大部分是倾向进步的，但也有政治观点模糊的，有个别的还是反动的。它们都纷纷在报纸副刊上或自办刊物上发表文章，宣扬自己的观点，甚至开展激烈的辩论。文艺界呈现一片活跃局面。一九三〇年四月，在一次座谈会上，成立“南昌革命文学研究会”，这个文艺组织，尽管有些反蒋倾向，但又带有反共色彩，政治观点不明确。后来在五月间，于国民党省党部礼堂（佳山庙对面，现市公安局内）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各界进步文艺青年，有学生、工人和小职员六、七十人。会上成立了“江西文艺作者联合会”，号召开展普罗文艺运动，从此普罗文艺就在南昌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在这前后，一些进步文艺青年如傅鸣平、张扬、黄一帆、秀俊、雷殷、殷泉水等人，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晨光》，《新闻日报》副刊《新潮》为主要阵地，有的文艺社团在副刊上编出专刊，如《追求社》编《追求》，有的还自办刊物，如郑慕农办青州书店（百花洲附近）出版《青州月刊》。在这些刊物上，先后发表不少进步文学作品或评论，如傅鸣平的《旧梦》，黄一帆（民德业校教员）的《十年》，雷殷的《送伤兵》等都先后发表于《晨光》的副刊《追求》。作者在这些作品里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社会黑暗的愤懑，抒发了对革命的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当时《追求社》还在上海《南国社》的影响下，大力提倡新戏剧运动，排练演出田汉的剧作《苏州夜话》，还自编自演话剧《好同志》，歌颂和塑造了一个在监狱中坚持斗争的革命英雄形象。这些新型戏剧在豫章公园（现中山堂）西侧同乐电影院演出时，获得各界进步青年和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中山路的江西书店，青州书店，经常出售上海各地新出版的进步文艺书刊，如《太阳》、《拓荒》、《洪荒》等，常常吸引着大批青年读者，流连忘返。

南昌普罗文艺运动的开展，很快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反动文艺作者的围攻和国民党当局的注视。《晨光》的编者易国杞

曾在报上著文驳斥道：《小南洲》等副刊，“借口本刊登载秀俊等人的文章及本刊的按语，大肆攻击污蔑，在他认为用一顶赤冠加在本刊头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其奈事实何？”

果然不久，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熊育筠出面向《晨光》副刊编者易国杞追查一些进步文艺作者的下落，傅鸣平、雷殷等闻讯后，被迫连夜离开南昌，避居外地多时。秀俊（万希文笔名）也逃往乡间避居将近一年。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江西文艺作者联合会”，也遭封闭，禁止活动。该会负责人沈默等被逮捕，并扣上“共匪”首脑的帽子，被卫戍司令部枪杀了。黄一帆等也以“供认同情普罗文学不讳”的罪名而遭到枪杀。大批进步青年作者被迫离开南昌。曾经轰动一时的普罗文艺运动，在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下，被迫转入了地下斗争。

三、星火燎原反“围剿”

1927年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建立以后，星星之火很快发展成为燎原烈火，至1930年夏秋之际，革命根据地已有大小十五个，遍布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各省边界地区。正规红军发展到十三个军，共六、七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当蒋、桂、冯、阎之间混战暂告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首先集中了七个师的十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南昌卫戍司令张辉瓒为前方总指挥，于十二月底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我红军英勇反击下，只用五天时间，就粉碎了这次“围剿”，敌军全军覆没，张辉瓒当了俘虏，谭道源仅以身免。因为张辉瓒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经苏区革命人民公审判处极刑，弃尸赣江。当“张屠夫”的尸首被捞起运来南昌时，极大地震动了反动派，国民党的大小官吏，以省主席鲁涤平为首亲往哭弔，兔死狐悲，恶有恶报，“张屠夫”

落得这个可耻的下场。对一切作恶多端的反动派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准备了四个月，于1931年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调集了二十万人马，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在南昌贡院背专门设有“官邸”飞机来去，声势显赫，但是经过半个月激战，被我红军缴枪两万多支，何应钦也同样遭到惨败，灰溜溜地逃回南京去了。

离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仅仅一个月，蒋介石又凑集了三十万大军，在七月里进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来到南昌，自任总司令，并请来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军事顾问来为他出谋划策。敌军分三路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围剿”仍然被红军粉碎了。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在溜回南京之前，仍在南昌厚颜无耻地吓唬群众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他的卖国贼的咀脸，在这几句话里原形毕露了。1932年六月，蒋介石在葬送了上海抗战的果实、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后，接着调集了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再向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蒋介石仍自任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方面的总司令。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剿匪”会议，狂妄声称要彻底消灭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但我红军在毛主席的运动战方针指导下不断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还一度攻占丰城、临川、浒湾一些地区，直接威胁南昌。蒋介石这时急忙赶到南昌加强部署。1933年二月七日，在南昌百花洲设立了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南方七省的军事和政治，重新制订“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计划；调集各路主力部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地主豪绅们也组织“协剿会”，强拉民伕组成“铁肩队”，为反动军队运输辎重。反革命气焰，一时极为嚣张，南昌成了反革命“围剿”的大本营。但是到三月底，用毛主席战略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仍然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哀叹：“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

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失败过！”

不到黄河不死心，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想尽方法搜括民脂民膏，一方面以中央政府名义向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一方面向全省大肆搜括，实行苛捐杂税。捐税名目繁多，仅正式列入省财政收入项目的就有田赋、契税、营业税、船捐、屠宰税、典当税、菸酒牌照税、盐附捐，此外还有各种地方附捐。税额之重是空前未有的，仅以食盐为例，每担盐就要征收附加税六元。

1932年六月，反动当局公然以“围剿”革命根据地为名，举办所谓“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在南昌设立管理局，各地遍设分局和税所。无论本省出产物品或省外输入物品均须分别征收产、销捐，课税物品种类包括糖类等十三种。税率分为三等，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七点五，全省每年这项税收就在银洋二百万元左右。

搜括的另一种办法是大量发行公债。1930年春，以应付“剿匪”费用为名发行的公债，一次就是一百二十万元。1934年借口修建铁路，一次发行公债额又是一千二百万元。

所有这些搜括来的款项，绝大部分用来作为“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军费。根据1934年国民党江西省财政岁出数字统计，所谓“公安费”支出即达七百多万元，占全省总岁出的三分之一。其实，他项支出也都是直接间接为其军事“围剿”服务的。

1933年，南昌行营为了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围攻，采用经济封锁政策，实行物资封锁、交通封锁、邮电封锁。在物资封锁中又包括军用品和日用品。对日用品的封锁，首先是粮食的封锁，其次是食盐和火油。因为这些日用品是革命根据地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1933年七月，在南昌行营下面，专门设立江西粮食管理局，并制订《粮食统制暂行办法》。划定粮食封锁地带。在水陆要冲设卡检查粮食出入，邻近根据地的粮食均须迁移至所谓“安全区”，造成数百里粮食真空区域。颁发粮食运输证，管理粮食运输。企图断绝革命根据地的粮食输入。对于食盐和火油的封锁，同样在“南昌行

营”下面，设立江西食盐火油管理局，在各县、区，设立公卖委员会或分会。除南昌、新建两县外，其余各县均实行食盐、火油集中公卖。根据公卖办法规定：食盐火油采取官督商办，由公卖委员会集中经理，不准盐商和火油商人自由贩卖。而且各级公卖委员会及各户购买食盐、火油均有限量。如邻近根据地的地方，每次购进量不得超过当地人口五日的用量。至于各户则每人每日所需食盐以四钱至五钱为限，火油每小户（五口）不得超过二两。食盐的代用品如酱菜等均须抵算。每户每次购买量不得超过五日所需量。在办法中还特别规定，遇有红军进来时，必须立即将所存食盐、火油运走，搬运不及时，须立即倾入河塘中毁弃，各户也须将所存食盐掘地埋藏，火油则倒入阴沟，如果违犯上述规定，一律予以枪杀或判刑。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南昌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借口整顿市容，宪兵警察，动辄对市民进行敲诈勒索。当时南昌市流行一首民谣说：“黄光斗（省会公安局长），老黄狗（警察穿黄色制服），眯死猫儿害死狗”充分反映了群众对宪兵警察愤恨心情。

为了加强对群众思想控制和政治欺骗，1934年，由南昌行营政训处、省保安处、省会公安局，国民党省党部等单位合组“省会公民教育委员会”，负责对南昌人民进行反动的政治和军事训练。按照保甲组织将南昌划分为十区，每区又分为三个训练区，每个训练区配有训练员若干人。开设“公民训练班”，凡南昌人民，不分性别，每周每户须有一人参加受训，每逢星期日上午训练三小时，利用各机关、学校的礼堂和操场进行反动的政治宣传和军事操练。以三个月为一期，估计参加训练的约有五万多人。

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尽管这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年三月，日寇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后，继续发动对长城各口的攻击。蒋介石公然强令长城守军停止对日抗战后，他自己即匆匆赶回南昌，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十六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各路军队将领开会，会上强调：“徵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

的处罚”。接着又召开七省治安会议，拟定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计划”。这次，蒋介石采取了碉堡政策和步步为营的方针，建立起全省的碉堡网和公路网，来对付红军的运动战术。1933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两百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围剿”，特别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集中了五十万兵力，分四路进攻。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采取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开始主张全线出击，在敌人优势兵力和碉堡政策面前，战而不胜；后又转入全线防御，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突破敌人重围，退出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一小部分红军在项英、陈毅等同志率领下坚持游击战争。

由于红军主力转移。反革命大本营——南昌行营也迁到武汉去了。南昌仍然设立绥靖公署，由蒋介石的亲信顾祝同担任主任。将全省划分为八个“绥靖区”，继续对各地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这些红色游击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抗战爆发后，发展成为一支东南地区著名的抗日武装——新四军。

四、方志敏等同志谱写的壮烈史诗

早在1933年，在南昌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国民党反动派就遍贴悬赏告示：“凡生擒或献出赤匪方志敏头颅者，赏五万元。”。敌人提出重金，企图捕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团的创造者、江西农民运动杰出领袖方志敏，可见其用心险恶。1934年秋，党中央决定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红军七军团、十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同志率领，从赣东北向皖南行动。沿路遭国民党军队追击堵截。1935年一月二十四日，方志敏同志在怀玉山上陇首

村被叛徒出卖、至陷入包围而被俘，二月间被押解来南昌，直到八月六日在南昌英勇牺牲，在南昌行营（后改为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内关押了近七个月。

同方志敏同时被囚禁的有一同被捕的抗日先遣队的总指挥刘畴西和军长王如痴、曹仰山等，有随后押来的红十军保卫局长周群、师长李树彬、政委张胡天、组织部长唐植槐、师参谋长乔信明、团政委张文山等三十五人。在狱中被囚的还有中央苏维埃土地部长胡海、江西省保卫局长娄梦侠，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等。

方志敏被捕后，敌人为了宣扬“围剿”的胜利，将方志敏同志脚镣手铐，关在囚笼内，在弋阳等县城游街“示众”，可是方志敏同志却利用这个机会，每到一处就沉痛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共鸣。

二月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大批汽车将方志敏押解来南昌。敌人为了宣扬“围剿”的胜利，六日在南昌豫章公园（现在中山堂大院）召开所谓“庆祝生擒方匪大会”。被反动派强迫来的群众挤满了会场。方志敏同志不放弃任何一点为党工作的机会，当两个匪兵把他推到台上“示众”的时候，他面对着几千群众讲话：他说：

“同志们！同胞们！我很高兴还能和大家见见面，能和大家讲讲话……。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统治剥削，国已不国，民不聊生，只有实行共产主义……。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任务，努力奋斗！”

当时，台下的群众情绪由沉痛而激昂起来，台上的国民党官员们却愕然相向，急得连嚷：“拉回去！拉回去！”军官们慌忙指挥着士兵，把方志敏拉往后台，并立即拉出公园，推进铁甲车里开走。“庆祝大会”也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当时美国报纸记者的报导说：“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上脚镣手铐而站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

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之静默，适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反动派从此再也不敢举行所谓“示众”了。

在关押方志敏等的看守所内，牢房分成三等，最好的是优待号，用来关押国民党的官吏和有资产的阔人。其次是一等普通号，是关押一般中等社会人物和国民党军队的连排班长。最差的是二等普通号，专为囚禁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嫌疑犯以及红军战士。这种“号子”只能住十几个人的，却要关三十多个人。人挤人的睡着，甲的头睡在乙的脚边，乙的脚搭在丙的头上，大家都睡在地板上，牢房整天的锁着，绝不准互相往来。生活是最苦的，囚饭是用霉变的大米做的，饭色是黄的、稗子、谷壳、沙石很多，一股霉气，冲人欲呕。至于菜，每天两餐都是一钵清水白菜汤，八个人共一钵。每天只供两次开水，每次每人只能舀一大碗。这一大碗水，并不能全喝尽，洗面漱口，都在其内。囚犯没有换洗衣服，更没有水洗澡，一身骯臭。臭虫、跳蚤、虱子、不离身。囚人们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脱下衣服来捉虱。老鼠多到会咬去囚人的手指头。三十几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号子”里，各人的呼气，汗臭以及屎尿的臭气沆瀣在一起，空气的污秽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号子”里，不准看书、看报、高声说话和唱歌。可恶的狱吏故作傲慢的脸孔，吆吆喝喝，任意辱骂和鞭打犯人，在这样的牢笼里，病者占90%以上。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是方志敏在狱中作的一首豪壮诗句。开始，方志敏和刘、王、曹等被关押在同一牢房里。卧在竹床上，等候着那一颗子弹，或是一刀。“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方志敏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热烈的响应。刘畴西还坚持说：“将来升入天堂见上帝时，还一定要坐在上帝的左边。”

他们是这样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

一天晚饭后，方志敏同志被提到法庭去。军法处副处长一进法庭，就假装殷勤，怒声叫看守人员端凳子，凳子端上来了，说不好，又要端椅子，椅子又说摆得不好，大骂一顿。副处长还假意地礼让一番。坐定之后，即开口说：“今天提你出来，并不是审问你，而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说什么方志敏夫人组织了赴难军，于方志敏十分不利。接着又说：“我想向你进一次忠告，你们既已失败至此，何必这样固执，到‘国’方来做事好了。”处长进一步的进逼了。

“……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人必要的本领。”

“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你晓得孔荷宠吗？（在湖南自首的叛徒），他现在极蒙上面信任，少将参议，每月五百元的薪金。”

“他是个无耻的东西！我不能跟他一样。我不爱爵位，也不爱金钱。”

“哼！”处长的脸孔，突然变庄严了。“你须知你自己所作的事！…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警告你，这确不是好玩的！我看你是个人才，故来好意劝你，不然，不然，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但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有走死的一条路，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啦！”方志敏并没有怎样重视他的警告。

军法处长施用了一切的利诱和威胁手段。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向方志敏劝降说：“你们已经失败了，你为什么不愿意早日出狱做国民党的大官呢？！”方志敏同志马上严肃地驳斥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是暂时失败了，但在